

个人早期经历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张 浩 李文彬

(广东外语外贸金融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摘 要:人生早期经历对个人经济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考察这段经历对其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参与时长的增加,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和支出占比也会增加。本文还进一步发现,个人的风险规避倾向和对家人重视程度是知青经历影响其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主要渠道;而且知青经历对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在女性、兄弟姐妹数量较多以及下乡艰苦程度更高的群体中影响更强烈。同时,本文通过工具变量和模糊断点回归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依然稳健。

关键词:上山下乡 商业保险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中图分类号:F840.62 **JEL 分类号:**D14 G22 G14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生活保障的需求逐渐增大,我国保险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保险业总资产从2010年的5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3.3万亿元^①,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随着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居民健康、医疗、养老、住房等生活问题都对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老龄化引致的居民健康风险、家庭养老负担等问题日益突出。然而,目前我国社会基本保险只能满足居民基础的生活保障,商业保险在现代社会保障中的地位愈发重要。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要“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和“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这表明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在维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目前我国商业保险参与仍然存在较大缺口,2020年我国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风险与监管研究”(项目编号:18ZDA092)、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房地产金融风险传导机制与预警防范研究”(项目编号:2019A1515011649)以及广东省珠江学者奖励计划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

为3206元和4.45%，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809美元和7.4%相比，仍有较大差距。^①国内学者魏华林和杨霞（2007）认为，我国居民对保险的认知偏差、对保险市场的信任缺失以及保险产品的重复供给等问题导致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不足。居民商业保险的有限参与制约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商业保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保障作用受到限制。因此，深入探讨我国居民商业保险参与原因，提升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度，对促进我国保险业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保障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往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考察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第一，从宏观层面研究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主要从人口自然结构特征、人口社会特征和自然环境特征三个角度进行考察。其中，人口自然结构特征主要包括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张金林，2005）、男女性别比例等（廖海亚和游杰，2012），人口社会特征主要包括社会文化教育水平（郭金龙和张昊，2005）、已婚人口比重（张冲，2013），而自然环境特征主要包括恶劣气候（Turvey 和 Kong，2010）、空气污染（Chang 等，2017）、高温天气（Kong 等，2019）等方面。这些研究都表明，家庭或个人所面临的宏观因素冲击会改变个人的风险偏好以及对保险的认识和态度，从而影响其参与保险的决策。第二，从家庭层面考察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决策，如家庭收入水平、家庭资产水平等因素都是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重要因素（刘坤坤等，2012）。在其他家庭特征中，家庭规模、家庭就业人数、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也都会影响家庭的保险参与决策（樊纲治和王宏扬，2015；张雷和顾天竹，2020）。第三，从保险决策者角度研究个人特征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相关研究发现金融知识水平（秦芳等，2016）、社会互动（李丁等，2019）、风险态度（Cutler 等，2008）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然而，以往相关研究更多强调的是外部宏观环境对家庭保险决策的影响，虽然也有部分研究着眼于个人特征对其保险参与的影响，但是对这种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并没有涉及。事实上，个人过去经历对性格爱好、消费习惯和风险偏好等方面的塑造有深远的影响（Becker，1996）。近年来，相关研究越来越关注个人经历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在早期经历影响下形成的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和 risk 偏好对于个人的经济行为会产生影响，并最终使家庭资产配置发生变化。有学者认为，饥荒经历是造成中国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原因（程令国和张晔，2011）。汪小圈等（2015）发现，饥荒挨饿的经历会让个体更不愿选择自主经营；姚东旻等（2019）认为汶川地震的灾难冲击改变了灾区城镇家庭户主的未来效用偏好，个人对未来更有计划并逐步提高家庭储蓄水平。从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角度来说，商业保险购买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保险需求的感知，基于不同的个人经历，个人的保险需求感知可能会存在差异，因此，个人过往经历对其保险需求可能会造成影响。部分学者尝试从个人经历的角度理解其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主要从个人自然灾害经历的角度分析该经历对相对应灾害保险需求的影响。Cai 和 Song（2017）考察了灾害经验对农民参与天气保险的影响作用，他们发现，在告知灾害发生概率或通过游戏帮助了解灾害后，农民参与天气保险的可能性会增加。Lin（2020）分析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地震事件对家庭财务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地震经历使得家庭对地震危害的认知更深刻，因此在发生地震后，该地区家庭的地震保险需求会增加。以上研究表明，某些经历如灾害经历能改变个人对风险的认知水平，从而促进个人商业保险参与。

①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2021年。

1968年12月,中国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大规模展开,1700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进行艰苦劳作,这段经历在知识青年们的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上山下乡期间,知青们经历了物资短缺、艰辛劳作的农村生活,同时还经受与家人分离、教育被迫中断等困扰,这场磨炼使这些经历了上山下乡的青年们在思想、情感、生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樊冬梅,2005)。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上山下乡经历对个人性格偏好、价值观念的影响。彭树宏(2016)认为上山下乡经历磨炼了知青们吃苦耐劳的品质,这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突出并因此获得更好的收入,但是艰苦的生活经历显著降低了他们的生活幸福感。周广肃等(2020)指出,上山下乡经历改变了家庭收入水平和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Fan(2020)则发现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个体在财务决策中会表现得更保守,具体表现为持有较少风险资产以及住房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比较低,同时持有较多的储蓄和安全性资产。以上研究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个人性格偏好、行为习惯塑造有明显作用,艰苦的劳作生活对于知青们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这让他们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艰苦的生活经历提高了他们的风险规避倾向,导致其行为决策表现得更保守;此外,参与上山下乡造成的教育中断、亲人分离等生活经历缺失也导致了他们之后独特的生活追求。以上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决策,为此,本文将通过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知青经历对其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数据,实证研究了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和商业保险参与深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于没有知青经历的家庭,有知青经历的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提高了3.6%,商业保险支出比例提高了0.5%;而且知青经历的时长也会显著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决策。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工具变量和模糊断点回归方法对知青经历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决策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本文进一步探究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决策的作用机制,发现上山下乡的经历会通过个人风险规避倾向和提高个体对家人的重视程度两个渠道促进家庭的商业保险购买。

本文所做的贡献主要包括:一方面,以往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考虑个人经历层面因素。Cai和Song(2017)研究了自然灾害经历对农民商业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但是他们是以“被告知灾害发生概率”的形式作为“经历”体验,研究对象并没有亲身经历灾害,没有体现经历对个人性格或偏好的影响过程。而本文则从知青上山下乡经历的角度考察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程度,丰富了个人经历与家庭金融方面的文献。另一方面,本文进一步揭示了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作用机制,发现上山下乡经历提高了个人风险规避倾向;而与亲人分离的经历也提高了个体对家人的重视程度,这些都促进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本文通过考察个人经历对保险需求心理的影响过程,为理解家庭商业保险需求提供了新角度。

二、数据及模型

(一) 数据来源及主要变量定义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该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ISSS从2010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

CFPS 数据覆盖全国 25 个省, 14 960 户家庭。由于只有 2010 年调查问卷涉及“上山下乡经历”, 因此本文选择 2010 年 CFPS 调查结果作为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要被解释变量有两个, 包括: (1) 是否购买商业保险, 该变量为二值虚拟变量。本文根据 CFPS 问卷上“过去 12 个月, 您家用于购买商业性保险的支出是多少”, 对于所在家庭在商业保险中支出大于零的个体, 该变量取值为 1, 否则为 0。另外, 考虑到部分商业保险如终身人寿保险的保险期限较长, 有的投保人所购买的商业保险正处于保险期限内, 但已经结束了缴费期, 可能造成当年保费支出为 0。因此本文根据 CFPS 问卷“您有下列哪些福利、保险或补贴”, 将享有“补充医疗保险”的人视为已参与商业保险的个体, 该变量取值为 1, 否则为 0。(2) 商业保险的参与程度, 即家庭在过去 12 个月中商业保险的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

本文主要解释变量为个体是否有过山下乡经历的二值虚拟变量, 根据 2010 年 CFPS 问卷“您有过以下哪些经历”, 将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个体定义为 1, 否则定义为 0。^① 在其他解释变量方面, 参考现有文献,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②、婚姻状况^③以及是否在业,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净资产、家庭纯收入、家庭规模、家庭少儿占比 (16 岁以下)、家庭成员是否参与社会保障^④以及是否为城镇家庭。

考虑到年龄较大的群体在商业保险参与中存在拒保的现象以及该群体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影响较小, 本文剔除了样本中在 1930 年之前出生即在 2010 年调查时已经 80 多岁的群体。周广肃等 (2020) 都指出, 上山下乡运动在恢复高考制度后 1977—1979 年这段时间内逐渐被取消, 按照当时的学历教育制度推断^⑤, 最后一批参与上山下乡的群体大致出生于 1960 年, 因此, 本文只保留了出生年份在 1930—1960 年的样本。

上山下乡政策的目标为学历为初中及以上的非农村户口人群, CFPS 个人问卷中包含了受访者在不同年龄段的户口信息, 由于在 1960—1970 年间, 政府严格管控城市人口往农村的迁移, 个人户口性质较难发生变化。参考周广肃等 (2020) 的研究方法, 本文假设受访者在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期间与 12 岁时的户口一致, 因此选择受访者在 12 岁时的户口性质作为划分标准。本文对不符合上山下乡政策标准的样本进行剔除, 只保留符合上山下乡政策标准即满足学历为初中及以上且 12 岁时为非农村户口的样本, 最终本文样本包括 1 052 户家庭共 1 458 个个体, 其中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为 511 人, 占总样本人数的 35%。^⑥ 在参与上山下乡的样本中, 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为 18.6%, 家庭商业保险支出在家庭收入中占比为 1.5%, 对于未参加上山下乡的群体, 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比例

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数据的限制, 本文考察了个人 (包括符合筛选条件的家庭户主和其他家庭成员) 上山下乡经历对其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 而并非仅仅是户主。

② 根据访员观察的受访者健康状况, 取值范围 1—7, 数值越大, 受访者健康状况越好。

③ 婚姻状况定义为当受访者“有配偶 (在婚)”取值为 1, 其余情况取值为 0。

④ 根据采访问卷中“受访者享有哪种医疗保险”和“您参保了哪几种养老保险项目”, 将家庭所有成员均没有参与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情况定义为 0, 其余情况定义为 1。

⑤ 周广肃等 (2020) 指出, 当时我国教育规定, 入学儿童必须在当年 9 月份满 7 周岁才具备入学资格, 小学、初中、高中分别对应的教育学制年限为 6 年、3 年、3 年。

⑥ 因篇幅所限, 本文省略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栏目下载。

为 14.8%，商业保险支出占比为 1.2%，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群体在商业保险参与率和商业保险支出占比中都高于未参与上山下乡的群体。

（二）实证模型的构建

本文通过构建以下 Probit 模型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可能性的影响：

$$\text{Probit}(\text{decision}_i = 1 | x_i) = \beta_0 + \beta_1 \times D_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 decision_i 是个体 i 的家庭一年内是否购买商业保险的虚拟变量；主要解释变量 D_i 为个体 i 是否有上山下乡经历； x_i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另外，本文还通过 Tobit 模型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

$$\text{Insurance_ratio}_i = \beta_0 + \beta_1 \times D_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_i = \max(0, \text{Insurance_ratio}_i) \quad (2)$$

式（2）中，被解释变量 Insurance_ratio_i 表示个体 i 的家庭一年内商业保险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主要解释变量 D_i 和控制变量 x_i 与式（1）相同。

同时，在 1968 年 12 月开始大规模展开的上山下乡运动中，1966、1967、1968 届初高中毕业生即“老三届”是第一批参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按照当时的学历制度推算，参与上山下乡运动中年龄最大的 1966 届高中毕业生的出生年份应该在 1946 年，因此，在 1946 年之后出生的群体中，经历上山下乡运动的人数会大规模增加。本文选择“个体是否出生于 1946 年后”作为工具变量分别对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和参与程度进行 2SLS 模型回归。^①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分别利用 Probit 和 Tobit 模型探讨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和家庭商业保险支出占比的影响，表 1 为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回归结果。

表 1 第（1）—（3）列给出了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决策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Probit 模型与 OLS 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在 5% 水平上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第（2）列结果为例，具体而言，相对于没有参与上山下乡的群体，有知青经历的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提高了约 3.6%。

第（4）—（6）列为上山下乡经历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程度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提高了家庭商业保险支出的比例，该作用在 5% 水平上显著。Tobit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程度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相对于没有参与上山下乡的群体，有知青经历的家庭对商业保险的支出比例提高了约 0.5%，按 2010 年 CFPS 数据家庭收入的均值来算，有知青经历家庭的商业保险保费支出大约提高了 169 元。

① Lwebel 等（2012）指出，当 Probit 模型中解释变量为离散型变量（本文中解释变量为上山下乡经历）时，通过 IV-Probit 估计的结果是有偏的，因此本文以通过 2SLS 进行工具变量回归。感谢审稿人的建议。

表1 上山下乡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变 量	商业保险购买			商业保险参与程度		
	Probit (1)	Probit (2)	OLS (3)	Tobit (4)	Tobit (5)	OLS (6)
上山下乡经历	0.045 ** (0.018)	0.036 ** (0.017)	0.038 ** (0.017)	0.006 ** (0.003)	0.005 * (0.003)	0.003 * (0.002)
是否城镇家庭		-0.032 (0.054)	-0.025 (0.047)		-0.001 (0.007)	0.004 (0.003)
性别		-0.004 (0.011)	-0.006 (0.010)		0.000 (0.002)	0.001 (0.002)
年龄		-0.005 *** (0.002)	-0.004 *** (0.001)		-0.001 *** (0.000)	-0.001 *** (0.000)
婚姻状况		-0.052 (0.044)	-0.052 (0.039)		-0.003 (0.007)	0.000 (0.004)
受教育年限		0.002 (0.003)	0.003 (0.003)		0.000 (0.001)	0.000 (0.001)
家庭规模		0.010 (0.019)	0.012 (0.021)		0.001 (0.003)	-0.000 (0.002)
家庭少儿占比		0.316 (0.232)	0.345 (0.266)		0.039 (0.030)	0.007 (0.013)
家庭净资产		0.026 *** (0.005)	0.018 *** (0.002)		0.005 *** (0.001)	0.002 *** (0.000)
家庭纯收入		0.061 *** (0.015)	0.055 *** (0.014)		0.005 ** (0.002)	-0.001 (0.002)
健康状况		-0.003 (0.005)	-0.003 (0.005)		-0.000 (0.001)	0.000 (0.001)
是否工作		0.044 ** (0.017)	0.051 ** (0.021)		0.004 (0.003)	0.001 (0.004)
社会保障		0.111 ** (0.048)	0.043 ** (0.019)		0.017 * (0.009)	0.006 ** (0.003)
省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 458	1 458	1 458	1 458	1 458	1 458

注：表中报告的是各变量边际效应值，括号内数字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根据前文分析，最早参与上山下乡的一批人出生年份大概为1946年，出生在1946年后的群体中，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群比例上升，因此本文选择“个体是否出生于1946年后”作为个体是否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工具变量，探讨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表2第(1)一(2)列为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的检验结果，本文通过OLS和Probit模型考察了个体出生年份与上山下乡经历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时间节点（1946年）与个体上山下乡经历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于1946年之前出生的群体，出生于1946年后的群体参与上山下乡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同时，工具变量回归第一阶段的F统计值为79.06，远大于弱工具变量检验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因此，本文选择“个体是否出生于1946年后”作为个体是否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工具变量是有效

且可行的。^①一方面,本文通过工具变量回归检验了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表2中第(3)列通过2SLS模型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进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另一方面,本文也通过2SLS模型检验了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支出占比的影响,表2第(4)列为检验结果。回归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显著促进了家庭在商业保险中的参与程度,该结果也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上述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商业保险参与具有促进作用,它不仅提高了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也提高了商业保险在家庭支出中的占比。

表2 工具变量回归

变 量	上山下乡经历		商业保险购买	商业保险参与程度
	OLS	Probit	2SLS	2SLS
	(1)	(2)	(3)	(4)
上山下乡经历			0.157 ** (0.071)	0.024 ** (0.011)
是否出生在1946年后	0.491 *** (0.068)	0.623 *** (0.09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省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 458	1 458	1 458	1 458
一阶段 F 统计值			79.06	79.06

(三) 上山下乡参与时长与商业保险参与

前文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会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产生显著影响,但这种经历的参与深度对保险购买行为是否也存在影响呢?为了进一步探讨上山下乡参与深度与商业保险参与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2010年CFPS问卷中“上山下乡:哪年开始的”、“上山下乡:到哪年结束的”计算得到知青上山下乡参与时长(年),然后以上山下乡参与时长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进行回归分析。

上山下乡时长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回归结果显示^②,前3列通过Probit、IV-Probit和2SLS模型考察了参与时长对其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后三列通过Tobit、IV-Tobit和2SLS模型考察了参与时长对家庭商业保险支出占比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不仅能促进家庭参与商业保险,个人参与上山下乡时长也能显著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决策,随着上山下乡参与时长的增加,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和支出占比都会增大。

(四) 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提高了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高了商业保险在家庭支出中的占比。那么个人的知青经历是如何影响其家庭参与商业保

① 对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问题,出生年份无法直接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不同个体也不会由于不同出生年份而具有不同的个人特质,出生年份不会对个人收入、能力、家庭背景、风险偏好等特征造成影响。“附录与扩展”中表A8的实证结果也从一个侧面论证了“是否出生于1946年后”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确实并不显著。同时,本文还进行了近乎外生工具变量检验,在近似外生的情形下,上山下乡经历的估计系数在95%水平的置信区间为(0.0185, 0.6856),依然显著为正。因此,以“个体是否出生于1946年后”作为工具变量的IV估计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② 上山下乡参与时长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险的呢？本文主要从风险规避倾向和对家人重视程度两个方面进行机制分析。

1. 风险规避倾向

风险态度是影响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规避未知风险带来的损失，风险厌恶或对损失容忍程度低的人群会对购买保险表现出更强烈的意愿（Hemenway, 1992）。大饥荒、上山下乡等艰苦经历导致了个体对未来的保守预期，他们会倾向规避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由于不愿承受过多的风险，他们的财务行为会表现得更保守（Fan, 2020）。因此，本文猜测上山下乡经历可能提高了知青的风险规避倾向，进而导致他们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增加。

由于2010年CFPS问卷并没有涉及个人风险态度的问题，本文通过2014年CFPS数据得到关于家庭风险态度的数据，然后根据家庭编号（fid）与本文研究样本进行匹配。^①本文通过两种方法检验家庭风险态度是否为上山下乡经历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作用机制：（1）2014年CFPS家庭问卷中问及“假如您家投资/在投资中，您愿意承担的风险如何”，本文将回答“不愿意承担任何投资风险”的群体设定为风险规避人群，其余群体设定为非风险规避人群。（2）CFPS家庭问卷中还问及“假如将当前您一年的全部收入用于投资，您所能容忍的最大损失比例是多少”，本文根据样本中损失容忍比例的三分位点将研究样本分为损失容忍程度高、中、低人群，然后对“非风险规避”和“风险规避”以及不同损失容忍程度的子样本进行2SLS模型回归。

表3为风险规避机制的检验结果，第（1）、（2）列结果表明，对于风险规避的人群，上山下乡经历显著促进了家庭参与商业保险，而对于非风险规避群体，上山下乡经历影响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作用较小且不显著。在不同损失容忍程度的三个群体即第（3）、（4）、（5）列的回归结果中，对其损失容忍程度最低的人群，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于中等和较高损失容忍程度的人群，虽然上山下乡经历对于参与商业保险有正向作用，但与损失容忍程度低人群相比，该影响作用较小而且在统计上不显著。事实上，商业保险一个重要的基础作用就是对冲风险，对于风险厌恶人群，他们更有意愿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满足自身规避风险的需求。上山下乡经历在风险规避的人群中显著促进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而且随着个体对损失容忍程度的降低，上山下乡经历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大且显著。因此，本文认为上山下乡经历可能会通过提高风险规避程度来促进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表3 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机制——风险规避倾向

变 量	风险规避		能容忍的最大损失比例		
	非风险规避	风险规避	高容忍程度	中容忍程度	低容忍程度
	(1)	(2)	(3)	(4)	(5)
上山下乡经历	0.010 (0.084)	0.407** (0.168)	0.113 (0.126)	0.228 (0.223)	0.313** (0.1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94	441	240	276	319

① 本文分别根据2014年CFPS问卷中“假如您家投资/在投资中，您愿意承担的风险如何”和“假如将当前您一年的全部收入用于投资，您所能容忍的最大损失比例是多少”提取受访者的主观风险态度信息，然后再将2014年CFPS的调查结果匹配到2010年CFPS的研究样本中。

2. 对家人重视程度

缺少家人的陪伴成为许多知青下乡期间的遗憾，对于在过去艰苦经历中缺失的资源或无法实现的愿望，个人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渴望去实现它。下乡期间对家人的思念可能会让知青们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加重视自己的家人，他们在生活中关爱自己的家人，希望为家人提供生活保障。因此他们在生活中会更愿意购买商业保险，这样当自己遭遇意外事故时，商业保险赔付能保障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樊纲治和王宏扬，2015）。基于此，本文猜测上山下乡的经历会提高知青对家人的重视程度，为了避免自身疾病或意外事故等风险给家庭造成损失，他们通过为自身购买商业保险，给家人的正常生活提供保障。

为了检验上山下乡经历是否会通过影响对家人重视程度进而影响其家庭商业保险参与，本文通过以下三种方法进行检验：（1）根据 CFPS 个人问卷上“在上面提到的问题中，您认为哪个问题对您是最重要的”进行划分，将认为“家庭美满、和睦”重要的人群设定为“重视家庭美满”群体，其余人群设定为“不重视家庭美满”群体。（2）根据 CFPS 个人问卷上的问题“对您而言，家庭美满、和睦的重要程度（打分 1—5 分，分数越高，重要程度越高）”，将家庭美满的重要程度打 5 分的受访者设定为“家庭美满重要程度高”组别，其余的受访者设定为“家庭美满重要程度低”组别。（3）CFPS 家庭问卷上问及“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打分 1—7 分，分数越高，亲密程度越高）”，根据受访者家庭成员间关系打分的中位数将研究样本分为“亲密程度低”和“亲密程度高”的家庭，本文对不同家庭美满重视度、家庭成员亲密程度以及是否重视家庭美满的子样本进行 2SLS 模型回归。

表 4 为对家人重视程度机制的检验结果，其中第（1）、（2）列考察了个人是否重视家庭美满的影响作用，在重视家庭美满的子样本中，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于不重视家庭美满的个体，上山下乡经历对商业保险参与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第（3）、（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家庭美满重视程度高的人群，上山下乡的经历会促进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行为，该影响作用在 5% 水平下显著，而对于重视程度低的人群，上山下乡对保险参与的正向作用略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第（5）、（6）列的结果表明，对于家人亲密度高的群体，上山下乡经历促进了其商业保险购买决策，而对于亲密程度低的群体，上山下乡经历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家人重视程度高的群体中。上山下乡期间与家人分离的经历让知青们更珍惜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更重视自己的家人。因此，他们更愿意为自身购买商业保险，这样当他们遭遇自身疾病、意外等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时，商业保险的赔付可以为家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保障。

表 4 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机制——对家人重视程度

变 量	是否重视家庭美满		家庭美满重视度		家庭成员亲密程度	
	不重视 家庭美满	重视 家庭美满	重视 度低	重视 度高	亲密 度低	亲密 度高
	(1)	(2)	(3)	(4)	(5)	(6)
上山下乡经历	0.097 (0.090)	0.273*** (0.098)	0.175 (0.179)	0.164** (0.074)	-0.016 (0.087)	0.248* (0.14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883	575	350	1 108	647	689

综合以上分析^①，上山下乡是知青难忘的一段经历，从优越城市到落后农村的巨大落差，让他们的性格、心理及习惯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落后的生活环境、与亲人分离以及农村艰苦劳作的经历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人生早期艰苦的经历让他们过早体验到了生活的艰难，这导致了他们在日后生活中更不愿意承担风险（汪小圈等，2015），因此他们的经济决策行为更倾向于风险规避。同时，上山下乡期间对亲人的思念使得他们更重视自己的家人，为了避免疾病、意外事故等风险对家庭造成巨大损失，他们很有可能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给自己和家人的正常生活提供保障。

四、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基于模糊断点回归的稳健性分析

参考过往学者的研究方法（周广肃等，2020），本文通过断点回归对前文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大规模展开并具有强制性的特点（潘鸣啸，2005），上山下乡参与人数在1968年大量增加。同时，由于家庭独生子女以及患有重大疾病或身体残疾等特殊情况可以免于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并非出生于1946年后的符合标准群体都参与了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参与率在出生年份节点 c_0 （1946年）上不是一个准确的跳跃过程。根据这一特征，本文选择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方法检验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参考周广肃等（2020）的研究方法，本文将满足学历为初中及以上且12岁时为非农村户口的人群设定为符合上山下乡政策标准（Eligible）的群体，将学历在初中以下或12岁时为农村户口的人群设定为不符合上山下乡政策标准（Ineligible）的群体。由于断点回归假设要求断点两边样本具有相同的特征，因此本文选择Eligible群体作为模糊断点回归的样本，然后对Ineligible群体进行断点回归的安慰剂检验。

1. 断点回归的有效性检验

（1）驱动变量即出生年份在断点处的连续性。由不同户口类型下各年份新生人数可以看出^②，在1930—1960年间，无论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每年出生的人数都呈现较为平滑的增长，没有急剧的变化，说明个人无法自主选择自己的出生时间或户口类型，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外生冲击，本文研究方法是有效的。

（2）参与上山下乡的可能性和商业保险参与在断点处的跳跃。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将断点 c_0 设定为个体是否出生于1946年后，为了检验参与上山下乡的人口比例以及商业保险的参与率是否会在断点处发生跳跃，本文分别展示了符合标准群体与非标准群体在出生年份节点前后的上山下乡和商业保险参与情况。^③对比可以发现，在1946年后，符合标准群体中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群比例发生明显的提高，而非标准群体中的上山下乡比例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符合标准人群在出生年份节点之后商业保险参与率有所提升，而非标准人群始终维持在0.1左右的商业保险参与率。可以看出，对于符合标准

① 为保证影响机制分析的完整性，本文还实证考察了影响机制即风险规避倾向和家人重视程度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风险规避倾向和家人重视程度对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② 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图A1。

③ 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图A2。

人群，出生于 1946 年之后的群体在上山下乡比例和商业保险参与率中都有明显的提高。

2. 断点回归结果分析

对于符合上山下乡标准的群体，本文利用模糊断点回归的方法对知青经历影响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进行非参数估计。断点回归的结果显示^①，回归中控制性别、年龄、家庭规模、家庭少儿占比、家庭纯收入、家庭净资产、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情况、是否城镇家庭和是否拥有社会保障等变量作为断点回归中的协变量。^② 其中，第（1）列没有控制其他协变量，第（1）—（4）列选用了 Triangle 核函数，第（5）—（6）列选用了 Epanechnikov 核函数，同时，还根据出生年份在 1946 年前后 8 年、10 年和 12 年进行不同带宽的结果检验。回归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于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于出生于 1946 年后且参与上山下乡的群体，他们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显著提高，该结果在选择不同带宽、不同核函数时依然保持稳健。

3. 安慰剂检验

前文采用模糊断点回归的方法验证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识别模糊断点的标准是个体是否出生于 1946 年后，可能会存在“群体效应”（cohort effect）即存在无法估量的原因导致 1946 年后出生的群体在商业保险参与中存在差异（周广肃等，2020）。为了检验是否存在群体效应，本文用“个体是否出生于 1946 年后”变量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进行检验。由于群体效应不仅在 Eligible 的群体中存在，也会对 Ineligible 群体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选择 Ineligible 群体作为检验群体效应的研究样本。当存在群体效应时，“个体是否出生于 1946 年后”会对商业保险参与产生显著影响，当不存在群体效应时，则不会有显著的影响。

群体效应的检验结果中，第（1）—（2）列为时间节点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决策的 Probit 回归结果，第（3）—（4）列为时间节点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程度的 Tobit 回归结果。^③ 结果表明，无论是对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还是参与程度，时间节点都无法产生显著影响，因此群体效应并不存在，前文的实证结果保持稳健。^④

（二）基于样本调整的稳健性分析^⑤

第一，区分户主与非户主群体。由于家庭户主与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庭经济决策中可能会存在不同的作用，本文根据 2010 年 CFPS 问卷中“谁是家中的主事者”将样本分为

① 断点回归结果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中表 A5。

② 在进行断点回归前，本文已经检验了协变量在断点处的连续性，结果表明，各协变量在断点处都没有发生跳跃，从而不会影响本文断点回归的估计结果，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③ 群体效应检验结果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中表 A8。

④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中运用 IV 估计的商业保险购买差异不是由于群体效应导致的，本文分别在符合上山下乡标准的样本（Eligible）和不符合标准的样本（Ineligible）中同时考察上山下乡经历、“是否出生于 1946 年后”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对于符合上山下乡标准的样本来说，上山下乡经历影响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是否出生于 1946 年后”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对于符合上山下乡标准的群体，是上山下乡经历促进其保险参与行为，而不是 1946 年后出生的 Cohort Effect，进一步验证了安慰剂检验结果的可靠性，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⑤ 该部分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非户主和户主。回归结果表明，家中成员无论是否为户主，其上山下乡经历都对家庭购买商业保险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相对而言，由于户主在家庭财务决策中有更主要的决定权，与其他家庭成员相比，户主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影响作用更强烈。

第二，放宽样本筛选条件。由于最初的样本核定过于严格，所以本文还放松样本筛选条件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将样本出生年份放宽至 1920—1970 年；二是将样本出生年份放宽至 1920—1970 年，同时将样本受教育程度放宽至小学以上（受教育年限在 6 年以上）。结果表明，在放宽筛选条件后，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异质性分析

由于家庭特征的异质性，上山下乡经历的影响会存在差异，本文将从个人性别、兄弟姐妹数量（不包括本人）和知青下乡所在省份的知青人均经费支出考察上山下乡经历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对不同特征的家庭进行 2SLS 回归。^①

从根据个人性别分组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女性，上山下乡经历显著促进其商业保险参与，而对于男性，上山下乡经历对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与男性相比，女性有更强烈的主观风险认知（Harris 和 Jenkins，2006），她们会表现出更低风险的选择倾向，上山下乡经历更容易放大女性参与者对潜在风险的感知，因此上山下乡经历对女性参与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会更强烈。本文根据受访者兄弟姐妹数量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兄弟姐妹“数量少”和“数量多”群体。根据受访者兄弟姐妹数量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兄弟姐妹数量多群体的商业保险参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兄弟姐妹数量少的群体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由于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会稀释家庭的有限资源（Downey，1995），对于独生子女或兄弟姐妹较少的家庭，孩子会得到父母较多的关注，容易导致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担心和干涉（聂景春等，2016）。而在兄弟姐妹数量多的家庭，孩子得到父母的关心相对较少，他们更加独立，上山下乡的经历进一步提高了他们自我保护的防范意识，他们会更倾向于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等方式来为自己的日常生活提供更多保障，因此对于兄弟姐妹数量多的个体，上山下乡经历对其商业保险参与决策的促进作用更强烈。

我们还汇报了根据地区知青人均经费支出^②分组的回归结果。由于 2010 年 CFPS 问卷中问及个体参与上山下乡的所在省份，本文将个人下乡的省份与各省知青人均经费支出进行匹配^③，得到个人下乡所在省份的知青经费支出情况。知青专项经费和专项物资是保障城镇知青下乡基本生活的基础（顾洪章，2009），经费支出能帮助知青们解决在农村生活物资短缺的问题，因此，知青下乡期间生活艰苦程度与下乡安置地的知青经费支

① 上山下乡经历影响商业保险参与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② 地区知青人均经费支出定义为上山下乡期间各省的知青经费支出与上山下乡期间各省安置下乡人数的比值。本文根据各省下乡期间知青人均经费支出的中位数，将受访者分为“人均经费低”和“人均经费高”两组。

③ “知青人均经费支出”来源于《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2 版）》。由于资料中缺少重庆市、上海市、河北省、西藏自治区等地区的知青经费相关数据，该分析结果中总观测值小于基准回归中的观测值。

出有很大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下乡所在地经费支出较低的群体,上山下乡经历显著提高了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而对于经费支出高地区的群体,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上山下乡经历对于知青们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这段艰苦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不愿承担过多风险,随着下乡经历艰苦程度的加深,这段经历在他们生活中留下的印象越深刻,他们的风险规避倾向越强烈,因此他们更有意愿利用商业保险规避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上山下乡这段经历对知青心理、观念有重要影响,艰苦的生活体验是知青上山下乡期间最难忘的记忆片段,人生早期艰苦的生活经历让他们过早体验到了生活的艰难,这导致了他们对未来的保守预期,使他们在日后生活中不愿承担过多的风险,希望通过更谨慎的金融决策来规避生活中的风险。商业保险是社会生活中规避风险的重要工具,知青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为自身及其家庭提供生活保障,因此,对于风险识别更敏感或艰苦体验更深刻的知青,上山下乡经历对其参与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会更强烈。

五、结 论

人生早期经历对个人的金融决策行为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从过往经历影响个体性格形成的角度,考察家庭在商业保险市场中的行为差异,从个人过往经历层面理解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决策。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考察知青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知青经历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随着上山下乡参与时长的增加,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和支出占比也会增加。具体而言,相对于没有上山下乡背景的家庭,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提高了3.6%,在商业保险中的支出比例提高了0.5%。为保证研究结果稳健和直观,本文借助工具变量法和模糊断点回归对上山下乡经历影响家庭保险参与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地,本文探讨了上山下乡经历对其保险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知青经历可能会通过影响其风险规避倾向和对家人重视程度,进而影响其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发现,知青经历对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在女性、兄弟姐妹数量较多以及下乡艰苦程度更高的群体中影响更强烈。

本文丰富了个人经历与家庭金融决策方面的文献,帮助理解个人早期经历与其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从知青的视角考察上山下乡经历对其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物资较短缺时期,这种艰苦劳作的经历是当时一代人的生活体验,人生早期的艰苦生活经历塑造了他们具有共性的观念态度和家庭责任感,提高了他们对自己及家人的生活保障要求。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具有这种艰苦生活经历的中老年群体依然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家庭金融决策中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生活保障需求能为我国商业保险市场提供积极的发展动力。因此,政府应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中国历史背景发展联系起来,了解不同群体在人生早期经历下形成的共性保险需求,进一步优化我国商业保险服务供给,这有助于促进居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提高我国居民保险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参考文献:

1. 程令国、张晔:《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

- 释》[J],《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第119—132页。
2. 樊冬梅:《“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考察》[J],《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第110—115页。
 3. 樊纲治、王宏扬:《家庭人口结构与家庭商业人身保险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5年第7期,第170—189页。
 4. 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2版)》[M],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
 5. 郭金龙、张昊:《中国保险业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74—81页。
 6. 李丁、丁俊崧、马双:《社会互动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9年第7期,第96—114页。
 7. 廖海亚、游杰:《中国人口结构转变下的保险发展》[J],《保险研究》2012年第3期,第24—32页。
 8. 刘坤坤、万金、黄毅:《居民人身保险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粤东四市人身保险消费行为调查》[J],《保险研究》2012年第8期,第53—59页。
 9. 聂景春、庞晓鹏、曾俊霞、龙文进:《农村儿童兄弟姐妹的影响研究:交流互动或资源稀释?》[J],《人口学刊》2016年第6期,第5—16页。
 10. 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J],《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154—181、245页。
 11. 彭树宏:《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J],《劳动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6—122页。
 12. 秦芳、王文春、何金财:《金融知识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6年第10期,第143—158页。
 13. 魏华林、杨霞:《家庭金融资产与保险消费需求相关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0—81页。
 14. 姚东旻、许艺煊、张鹏远:《灾难经历、时间偏好与家庭储蓄行为》[J],《世界经济》2019年第1期,第145—169页。
 15. 张冲:《中国人口结构对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影响研究》[J],《保险研究》2013年第4期,第63—70页。
 16. 张金林:《中国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国内环境透视》[J],《管理世界》2005年第6期,第147—148页。
 17. 张雷、顾天竹:《子女增加会减少父母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J],《南方金融》2020年第5期,第63—72页。
 18. 周广肃、边晓宇、吴清军:《上山下乡经历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J],《金融研究》2020年第1期,第150—170页。
 19. Becker, G. S., 1996, *Habits, Addictions, and Traditions*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 Cai, J., Song, C., 2017, “Do Disaster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Affect Insurance Take-up Decision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24: 83-94.
 21. Chang, T. Y., Wei, H., Wang, Y., 2017, “Something in the Air: Pollution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 Insurance”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85, No. 3: 1609-1634.
 22. Cutler, D. M., Finkelstein, A., McGarry, K., 2008, “Preference Heterogeneity and Insurance Markets: Explaining a Puzzle of Insuranc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2: 157-162.
 23. Downey, D. B., 1995, “When Bigger is not Better: Family Size, Parental Resource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6-761.
 24. Fan, Y., 2020, “Does Adversity Affect Long-term Financial Behaviour? Evidence from China’s Rustication Programme”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115: 103218.

25. Harris, C. R. , Jenkins, M. , 2006, “Gender Differences in Risk Assessment: Why Do Women Take Fewer Risks than Men” [J],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Vol. 1, No. 1: 48-63.
26. Hemenway, D. , 1992, “Propitious Selection in Insurance” [J],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Vol. 5, No. 3: 247-251.
27. Kong, D. , Qin, N. , Feng, Z. , 2019, “Betting on Temperature: Psychological Bias in Insurance Purchases” [J], *Accounting & Finance*, Vol. 59, No. 5: 2993-3027.
28. Lewbel, A. , Dong, Y. , Yang, T. , 2012, “Comparing Features of Convenient Estimators for Binary Choice Models with Endogenous Regressors”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5, No. 3: 809-829.
29. Lin, X. , 2020, “Feeling Is Believing? Evidence from Earthquake Shaking Experience and Insurance Demand” [J],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Vol. 87, No. 2: 351-380.
30. Turvey, C. G. , Kong, R. , 2010, “Weather Risk and the Viability of Weather Insurance in China’s Gansu, Shaanxi, and Henan provinces” [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Vol. 2, No. 1: 5-24.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Household Commercial Insurance Purchases

Zhang Hao, Li Wenbin

(School of Finan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Individuals’ early life experience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their financial behaviors.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one of the largest labor force migration events in China, namely, China’s 1956 program to mobilize the urban educated youth to work in the countrysid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effect of the urban educated youth’s rural working experience on household commercial insurance purchases, using the data of the 2010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uch experience significantly encourages the household commercial insurance purchases. In addition, the experience dura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household insurance purchases. Furthermor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clination of risk aversion and family attention are influence channels. Accor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the urban educated youth’s rural working experience has a more obvious impact on commercial insurance purchases among women, those with more siblings and those with harder working experience.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robustness tests wit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methods are performed.

Keywords: China’s Rustication Program; commercial insuranc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JEL Classification: D14; G22; G14